重构中华文明本体论的一种思想方法

刘金祥

《文明论》，冯时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5年10月出版。

这部以独创的“三要三本”理论为核心的学术著作，试图从中国本土经验与思维结构出发，为重构中华文明本位论提供一种思想方法，特别是该书通过深透解析《周易》《尚书》《诗经》等经典文献，深刻揭示了天文与人文的内在逻辑关联，精辟阐述了中华文明以文德观与宇宙观所构建的两大核心思想，并借助天文考古学缜密论证中华文明至少八千年的历史。换言之，该书以丰赡坚弥的考古材料为依托和根基，以新异独特的诠释视角为经纬和贯通，持续而深刻地叩问一个核心问题，当文明标准长期由他者定义和书写，被自身遗忘的中华文明主体，如何寻回叙述权、阐释权和话语权？

《文明论》一书的首要学术贡献，在于其方法论上实现了极具自觉意识的突围。长期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往往陷于两种困境：要么过度依赖后世文献（如经史典籍），置身于“信古”与“疑古”的循环论争；要么完全以西方考古类型学、聚落形态学为参照，试图将中国材料“削足适履”地纳入西方理论体系，而冯时先生在《文明论》中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冯时先生精熟于考古学尤其是天文考古与古文字学的一手材料，对甲骨文、青铜器、玉礼器、早期星图等遗存有着细微而敏锐的洞察。更重要的是，他并非简单地将这些物质遗存视为单纯“史料”，而是将其置于一个动态的、生成性的认知系统中进行透析和解读。这个认知系统的参照系主要源自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传统，尤其是先秦时期逐渐成形的宇宙观、天道观与礼制观念。例如，他对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诸多遗迹、器物纹饰中蕴含的“天学”与“王权”“祭祀”关联的揭示，并非直接套用《周礼》《易传》等晚期文献的记载，而是让考古遗存“自我言说”，展示出一套自洽的、关乎时空秩序与权力建构的本土逻辑。史料文献在此扮演的角色，并非不容置疑的“史实”记录，而是提供理解这套逻辑可能性的思想语境与学术语汇。这种“以考古材料为体，以文献传统为用”的辩证互证法，使得其文明叙事既避免了实证主义考古学可能带来的意义碎片化，又规避了传统史学过度依赖文本的局限性，从而为构建一种内生性的文明解释框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正是基于自身独创的思想方法，冯时先生在理论层面提出了极具颠覆性的核心命题，即中国早期文明本质上是“礼制文明”，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连续性”，这对以西方经验为蓝本、强调“断裂”的经典文明理论范式构成了直接挑战。冯时先生在书中所论证的“礼制”，远非后世儒家系统化、伦理化的行为规范，而是根植于远古宗教祭祀、天文观测、宇宙模拟的一套整合性秩序体系。该体系通过玉器、青铜礼器、祭祀建筑（如观象台、宗庙）、礼仪空间（如墓葬、宫殿布局）以及与之配套的符号系统（如文字、纹饰），将天文、地理、人事编织成一个同构的、有序的“宇宙—社会”统一体。古代王权的合法性，正是源于对这套宇宙秩序的垄断性沟通与仪式性演示。因此，中国文明的诞生标志，在冯时先生看来，并非仅仅是城墙的构筑、人口的聚集或文字的发明，更关键的是一套以“礼”为核心的象征秩序与权力结构的成熟与制度化。无论是良渚文化的玉琮，抑或陶寺遗址的观象台，还是殷墟的祭祀体系，皆是这一“礼制文明”在不同阶段的物质显现。由此导出的“连续性”特征，则更为鲜明和深刻。它首先表现为文明核心特质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如红山、良渚）到夏商周三代，直至秦汉帝国的漫长演进中，未曾发生本质性的断裂与替换，而是在主题上不断深化、复杂化与整合。其次，这种连续性更体现为一种思维结构或文化“基因”的延续：即那种追求天地人和谐、注重整体关联、通过仪式与象征来建构社会秩序的倾向，成为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部分。冯时先生对文明的重构，实质上是将中华文明从“是否符合西方标准”的被动审视中解放出来，转而追问“中国文明自身运作的独特逻辑是什么”，并为“何以中国”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基于长时段内在理路的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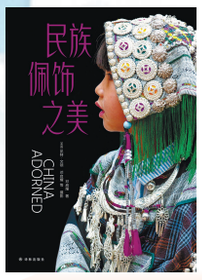
《文明论》一书的理论说服力，很大程度依赖于其对具体考古材料精微而富有想象力的诠释。冯时先生对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蚌塑龙虎图案与北斗星象的关联解读，对殷墟甲骨卜辞中天文历法内容的系统性分析，对早期青铜器纹饰（如饕餮）可能蕴含的宇宙论意义的探索，都令人耳目一新，展现出将冰冷遗物转化为活跃思想载体的卓越能力。这种诠释往往能串联起分散的材料，勾勒出以往被忽视的文明认知维度。然而，这种阐释性路径也必然伴随一定学术风险。首要风险在于“过度诠释”或“以今推古”。将后起（即便是先秦）文献中成熟的思想观念，投射到年代更早、语境模糊的考古遗存上，需要极其严谨的中间论证链条。某些关联性解读在缺乏更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可能被视为一种合理的、富有启发性的假说，而非确凿的结论。其次，在构建宏大统一的“礼制文明”叙事时，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平滑了不同地域文化（如长江流域的良渚与黄河流域的陶寺、二里头）之间的重大差异与可能的多元发展路径？强调“连续性”的同时，是否对文明演进中的变革、冲突、替代与断裂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冯时先生的理论如同一幅笔力雄健的写意画，轮廓清晰、气韵生动，但细节处的复杂性与模糊性或许有待更多实证研究的填充与检验。《文明论》的学术价值，最终需置于更广阔的思想史与文明对话的背景下考量。自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对自身文明的认识，长期深陷于“冲击—回应”的范式，或是在西方标准下进行辩护与比附，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姿态寻求断裂。冯时先生的研究，代表了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内在的“文化自觉”。它不是情绪化的民族主义宣泄，而是基于严肃的学术考量，试图从文明源头发掘并厘清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努力，旨在恢复中华文明在“元理论”层面的话语能力，即不仅讲述自己的历史故事，而且参与定义何为“文明”的普世讨论。这种努力对国际学界的意义重大。它迫使我们反思，当前被视为普世的文明史叙事，在多大程度上是特定历史经验的抽象化与普遍化？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否存在多元的、平等的演进模式与评判标准？冯时先生的“礼制文明”范式，与西方学界近年来对“物质性”“仪式实践”“认知考古学”的关注不无暗合之处，但它提供了基于非西方材料的、自成体系的系统阐述，从而成为全球文明比较研究中一个无法忽视的、强有力的“他者”声音。它挑战了单一进化论图式，倡导一种真正多元、包容的文明观。

冯时先生《文明论》是一部兼具胆识与学识的著作。它成功地将中国早期文明研究从一种事实考证的层面，提升到了哲学反思与理论建构的高度。尽管其具体结论或许会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和学术争论而有所损益，但其开辟的方向——致力于从中国文明内部寻找理解其起源与特质的钥匙，并以平等的姿态参与全球文明对话——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当然，重构文明话语的旅程还在路上。如何进一步完善细化“礼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范围的具体形态与演变机制？如何在处理考古材料的客观性与理论阐释的主观性之间保持微妙的张力？如何将这一基于上古文明的理论框架，与对中国历史上古代时期乃至近现代性的思考进行创造性衔接与转化？这些都是冯时先生抛给当今学术界的、极具挑战性的理论课题。

《文明论》一书的主要价值，不仅在于给出了若干答案，更在于以一种近乎宣言的方式，唤醒了一种长期“失语”的文明自觉。它告诉人们，真正的文明自信，并非源于对辉煌历史的简单怀旧，而是源于有能力以自身独特的逻辑，清晰而深刻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在讲述过程中，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贡献不可替代的智慧。事实上，在这条由冯时先生开拓的思想地平线上，更多更深的学术探索才刚刚开始。

（作者为黑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民族佩饰上的文化传统



摘自《民族佩饰之美》，邓启耀著，译林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

20世纪60年代，中国服装总体样式简朴，几乎没有什么佩饰。那时人们经常开会，齐聚一起，一片灰蓝。我当时还小，以为世界就是这个色了。直到去中缅边境当知青，我才发现原来并不是这样。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德昂族女子都穿短衣和筒裙，款式、质料、纹饰和色彩各有特色，又很贴身，显出女性优美的线条。我被服饰艺术的直观形式所震撼。她们让我见识了世界并非只有一种颜色，把自己打扮漂亮是人之常情。

后来，我走的地方多了，看过各族霓裳，不由得赞叹那些依天时、地貌、物产和人文而生的服装，与自然和文化保持的谐和关系。中国五十六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服装佩饰。高原民族皮袍毛毡配珠宝银饰，刚柔相济；雨林民族蝉衫柔裙配鸟羽兽牙，野趣横生。不少民族支系繁多，每个支系甚至每个村寨的服装佩饰自成一体。一些民族，仅服装款式就多达上百种，皆做工精细，佩饰新奇。民间出人意料的创意，让专业艺术家和设计师惊喜连连；而衣装佩饰上深厚的文化意蕴，更让人惊佩不已。

我再次感受到服饰的“震撼”，是文化层面的。有一次，我到云南中部的苗族村寨做田野调查，按惯例找老人听他们“摆古”。老人家问：

“你咯（方言：意为‘是否’）认得字？”

这话问得我有些张口结舌，心想，咋这样问呢？

“祖公的事都记在这上面了。”老人家指着一个年轻女子的花裙子说。

裙子上没有字，只有许多美丽的蜡染和挑绣缝缀的图案。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真的一“字”不识。

于是，老人家指着衣装上的那些纹绣一一解释给我听，告诉我哪种图案说的是人和万物来源的创世神话，哪种花纹记录了前辈从黄河流域迁徙而来的故事，哪种针法来自谁的发明，哪种式样和颜色与人的信仰及命运紧密相连。这些故事，和他们的神话、史诗、民俗，竟然都是可以互证的。这是我在做田野调查时经常会遇到的情景。

景颇族谚语说：筒裙上织着天下的事，那是祖先留下的字。我们习惯的历史，大致是文字记录的历史。但在无文字时代以及无文字民族中，历史同样被以各种方式“书写”。在没有文字的民族中，人们以针为笔，用线作墨，将远古的神话、始祖的业绩、家族的宗谱以及他们希望记录的一切，“书写”在与身相随的衣装上。对他们来说，服饰就是一种无字的天书、象形的《史记》、随身携带的百科全书。即使在有文字的民族中，服饰同样可以凝成一种文化密码。民族服饰是出生、成年、婚恋和死亡的标志，是家庭、宗族、血亲承诺和社会承诺的象征；民族服饰及其冠服制度在社会组织中，与角色认同、文化认同和社会规范有着密切关系。民族服饰像一部形象的社会法典，规定了性别、年龄、民族、社会等级及分工等结构关系和社会角色。民族服饰同时也涉及许多宗教、禁忌和命运、灵魂及信仰等方面的文化意识。从民族服饰的款式、色彩、印染和织绣图案上，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而民族服饰的制作技艺和传承，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资源。

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构成的共同体，在长期的互动交融中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中国所有民族，无论大小，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本书主要聚焦中国南方地区和西部青海省部分民族，书中选取的这些“活”在现实世界的佩饰，虽不足以总览全貌，却也能由一斑窥全豹，让我们看到中国佩饰繁花似锦的景象。

本书从婴儿时期的佩饰说起，继而论述中国各民族在服饰上体现的文化传统，以及这些服饰是如何运用到人生各种仪式中的。人自离开与生俱来的“胎衣”的那一刻起，就被包裹进不同的“衣装”里了。这不同的衣装，便是不同的文化符号，它影响乃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将以什么形式出现。

古人以“冠笄之礼”为成年礼，于此时更衣改饰，标志着一个社会成员即将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到了嫁娶婚媾之时，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要让新人换上婚礼服饰。种种意蕴吉祥的新装奇饰，是祖先福泽的象征，它们为新婚夫妇带来好运。

生儿育女，意味着家族谱系的延续，各民族也多有相应的变饰习俗。当儿孙满堂，从父母辈晋升为祖父母辈时，许多民族还要通过服饰的特定象征形式，将族人敬仰的图、形、色赋予老人，作为对他们健康长寿的祝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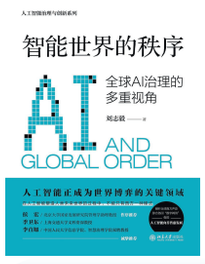
丧礼在重孝道的中国各民族中最受重视。中国的丧服制度历史悠久。古代丧服有所谓“五服制”，视服孝轻重对孝服的衣料、形制及穿服时间作了严格规定。把逝者生前心爱之物和佩饰随葬，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这种传统使得墓葬成为隐匿于地下的“博物馆”。

从生到死，人在不断地换装改饰中变换“角色”。服饰，成为美丽人生的一种见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重新获得重视。保护文化遗产的新政策，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带进了人们的视野。各民族服饰文化作为文化瑰宝，正展现其独特价值和创新潜力，既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更为当代创新提供灵感源泉。苗绣走进了国际秀场，侗布的纹理成了设计师的灵感，彝族银饰在年轻人的衣襟上闪光——传统并未褪色，而是在创新中找到了更长的生命。母亲们的针线活手艺正通过合作社、非遗工坊、文创品牌，变成可持续的生活选择。传统正以轻盈的姿态融入现代，既延续了文化的根脉，又焕发出新的生机。

当今世界，服饰的穿戴，已经没有那么多“规矩”了，人们穿衣戴饰，更多的是为了漂亮和人际交往。不过，传统之美，还是会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人生和世界永远的纪念。

大模型时代的新挑战



摘自《智能世界的秩序：全球AI治理的多重视角》，刘志毅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9月出版。

在人工智能发展进入大模型时代后，全球创新格局和治理体系面临着一系列本质性的深层挑战。这些挑战不仅体现在技术形态的根本性变革上，更深刻地反映了计算范式、人机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系统性转型。如斯坦福大学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所指出的，大模型的出现标志着人工智能从特定领域智能向通用智能的重要跨越，这种跨越性进展对全球创新体系和治理格局产生了全方位影响。

从技术形态来看，大模型时代最显著的特征是计算范式的革命性转变。与传统的专用算法模型不同，大模型展现出了强大的跨域泛化能力和涌现特性（Emergent Property）。以GPT-4为例，其在标准化考试、编程实现、创意写作等多个领域的表现均接近或超越人类专家水平，这种广谱性能力的实现标志着人工智能向通用智能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这种技术特征带来了三个层面的深刻影响：首先是创新模式的转变，从传统的任务导向型创新转向以数据和算力驱动的范式创新。以Anthropic的Constitutional AI为例，通过海量数据训练和价值对齐，探索出了一条全新的人工智能发展路径。其次是技术门槛的提升，训练大模型所需的算力和数据资源形成了极高的准入门槛。根据OpenAI的公开数据，GPT-4的训练成本据估计超过10亿美元，这种天文数字般的投入对大多数市场主体而言都构成了难以逾越的资源门槛。最后是应用场景的扩展，模型的通用性使其对社会生产生活的影响更加广泛和深入。根据斯坦福数字经济实验室（Stanford Digital Economy Lab）与OpenAI的联合研究，约80%的美国劳动力可能会有至少10%的工作任务受到大模型的影响，而约19%的工人至少50%的工作任务可能会受到影响。

人机交互模式的根本转变构成了大模型时代的另一个核心特征。通过自然语言理解和生成能力的突破，大模型首次实现了与人类的自然交互，这种交互模式的革新正在重塑人类社会的基本运作方式。剑桥大学的研究表明，新一代大模型在67%的对话场景中能够准确理解上下文和对话者的隐含意图，这一水平已经接近人类表现。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自然交互能力正在从单纯的语言理解向多模态理解方向发展。以OpenAI的GPT-4V和谷歌的Gemini为代表的多模态大模型，能够同时处理文本、图像、音频等多种形式的输入，展现出更接近人类认知的理解能力。这种突破不仅改变了人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方式，更深刻地影响着认知形成、决策制定和价值判断的过程。

在社会影响机制方面，大模型技术呈现出显著的系统性特征。首先是影响范围的全面性，从个人生活到社会治理，从产业变革到文化传承，大模型的应用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2017年6月，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上，普华永道发布的《规模化奖励》（Sizing the Prize）报告称，到2030年，全球GDP预计将因人工智能技术增加约14%—26%，相当于15.7万亿美元，超过2016年中国和印度的产出总和。其次是影响程度的深入性，不同于传统技术工具对特定领域的局部影响，大模型正在重构人类社会的基础运行逻辑。例如，在教育领域，个性化学习助手的普及可能会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医疗领域，AI辅助诊断系统的应用正在重塑医患关系和诊疗流程。最后也是更为关键的是影响方式的复杂性，通过数据驱动和智能决策，大模型对社会系统产生着难以预测和控制的涟漪效应。牛津大学互联网研究所的分析指出，大模型技术的系统性影响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才能充分显现，这种长期性和不确定性对传统的治理范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大模型发展还带来了新型的治理需求。第一个层面是安全治理需求，包括模型安全、数据安全和应用安全等多个维度。2023年年底曝光的“GPT-4系统级漏洞”事件就暴露了大模型在安全性方面的潜在风险，这类事件凸显了建立更完善的安全评估和风险防控机制的紧迫性。第二个层面是伦理治理需求，大模型在决策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见、歧视等问题需要得到有效规制。例如，Anthropic的研究发现，即使经过严格的价值对齐训练，大模型仍可能表现出系统性偏见。Anthropic与非营利组织红木研究（Redwood Research）合作的一项研究结果显示，Anthropic的模型Claude等可能会展现“对齐伪装”行为，在特定环境下战略性地停止拒绝有害请求，以保持其内部偏好。第三个层面是发展治理需求，如何确保大模型技术的普惠性发展，避免形成新的“数字鸿沟”，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议题。根据联合国《数字合作路线图》的观点，全球“数字鸿沟”正在不断扩大，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人力资源和专业知识方面的缺乏限制了其参与先进技术发展的能力。随着人工智能特别是大模型的迅速发展，这种不平等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失衡。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大模型发展对全球创新格局的重构作用。在算力资源、数据积累、人才储备等关键要素的共同作用下，大模型技术呈现出显著的集中化发展特征。这种高度集中的创新格局可能导致全球数字经济的垄断化趋势进一步加强。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集中化趋势可能从技术领域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经济领域。例如，在就业市场上，大模型技术可能加速某些职业的自动化替代，同时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这种结构性变革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平等。根据麦肯锡2024年的研究，到2030年，美国经济中高达30%的工作时间可能会被自动化，这一趋势因生成式人工智能而加速。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分布可能呈现明显的不均衡性。

面向未来，大模型技术还将继续演进，可能带来更多未知的挑战。多模态理解、跨语言泛化、知识更新等方向的突破可能会进一步提升模型的能力边界。同时，随着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发展，可能出现全新的计算范式和架构方案。这种持续的技术演进不仅要求治理框架具有足够的前瞻性和适应性，更需要国际社会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协调机制。正如DeepMind首席研究科学家戴维·西尔弗（David Silver）所言，大模型时代的真正挑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如何确保这项技术能够真正造福人类社会。